

制度鏡像

——波蘭團結工會事件與中國改革開放的變奏

● 蔣華杰

摘要：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的發生恰逢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遭遇各類政治、經濟和社會困境之際。波蘭事件對中國社會形成直接衝擊，加上當時國內改革所遇問題被認為與波蘭情況高度類似，中國決策層對波蘭事件的認知迅速從外交層面上的反蘇轉向視為一種制度鏡像。波蘭事件加速中國1979年開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調整步伐。鄧小平意識到中國也有可能出現類似的事件，在政治改革問題上接受胡喬木殷鑒波蘭教訓的觀點，以陳雲為代表的主張計劃主導和謹慎利用外資的觀念一度成為領導層的經濟改革共識。長期而言，波蘭事件強化中國決策層在改革與開放問題上「謹慎學習西方，深刻鏡鑒蘇東」的制度鏡像思維，不僅左右中國在冷戰最後十年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軌迹，亦長遠影響整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

關鍵詞：波蘭 團結工會 改革開放 冷戰 制度鏡像

一 引言

1980年7月，波蘭國內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全國性罷工活動，以瓦文薩 (Lech Wałęsa) 為首的全國性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於9月成立並領導罷工，動搖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執政地位，持續影響整個1980年代的蘇東局勢。波蘭團結工會事件（以下簡稱「波蘭事件」）被視為

* 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跨學科創新團隊項目」(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項目編號：2018ECNU-QKT009)研究成果。感謝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韓鋼教授和蕭冬連教授、《二十一世紀》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老師的寶貴建議，文中錯漏概由筆者負責。

鐵幕崩塌的開端，全球冷戰由此開啟了通向終結的最後十年進程^①。在東方的中國，1980年恰是鄧小平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戰略方向後，開始醞釀具體政治、經濟改革的第一年。歷史又重新回到了與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高度相似的場景：當中國步入政治轉折和社會、經濟變革的關鍵路口時，遙遠的波蘭出現了足以令北京鏡鑒的政治異動，且其造成的衝擊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日後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

1956年波匈事件爆發時中國和蘇東國家尚處於蜜月期，相比之下，1980年波蘭事件發生之際，中國和蘇東國家已陷入政治、外交上的分裂。昔日的社會主義同盟已不復存在，雙方關係雖有種種解凍跡象，但正常的外交和制度化的經濟、文化交流尚未恢復。儘管如此，1980年波蘭國內發生的罷工運動對中國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依舊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影響。背後根本原因是，雙方各自的政治、經濟制度高度相似，且面臨着幾乎相同的改革問題，由此形成的心理類比生成鏡像效應，導致波蘭出現的問題被中國決策層視為極具借鑒價值，最終改變或強化了決策中的某些傾向。從過程和結果上講，波蘭事件促使中國共產黨再次在「以歐為鑒」的基礎上形成了對自身發展道路的独特思考與選擇，從而使得改革和開放的進程因萬里之遙的波蘭局勢的變化而發生微妙變奏^②。

波蘭事件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互動關係這一議題，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與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交叉邊界，它不僅能為觀察中國與蘇東國家關係提供一個新個案，且能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國際史乃至全球史的新視角。就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而言，改革開放自身具備兩個基本觀察維度：有關中國從西方國家引進技術與設備等一系列發展規劃，以及中國在改革限度和開放程度上對蘇東國家成功和失敗經驗的觀察與比較。前者已經多有討論，後者則是一個相對被忽視的維度，而波蘭事件無疑是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一系列制度鏡像的開端^③。

也正因如此，多數涉及1980年代中國內部政治、經濟改革話題的研究均注意到波蘭事件的影響。楊繼繩、李洪林和吳偉認為波蘭的罷工使中國國內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尋得藉口並導致因鄧小平講話而引起的政治體制改革出現「決定性逆轉」。此類聚焦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研究僅將波蘭事件視為一個國際背景來看待，並未深入探討事件本身與改革開放之間的內在互動。格諾因斯卡(Margaret K. Gnoinska)基於波蘭檔案的研究發現中國從波蘭事件中吸取了諸多教訓，並從國際關係史角度詳細考察了中國如何利用波蘭危機推進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威爾遜(Jeanne L. Wilson)從中波關係視角分析波蘭事件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影響，認為波蘭局勢為中國提供了一面鏡子^④。由於中文文獻和中國視角的相對缺乏，兩位學者的研究均未能準確、清晰地展現中共高層的認知和決策過程。

那麼這次「制度鏡像」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它對1980年代乃至當今中國形成了何種影響？本文結合冷戰國際關係史與改革開放史的視角，利用通過各種途徑公布的檔案材料，分析波蘭事件與中國改革開放變奏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重新審視事件對改革開放的影響和歷史意義。

二 「反蘇」與「改革」：1970年代末期的中波關係

1970年代末期的中波關係基本延續了自1960年代中蘇分裂之後形成的隔離、對立狀態，彼此間的信任並未回到1950年代友好合作的蜜月期。中波雙方都在由中蘇對立、中美準聯盟所構成的大三角格局下，在極為有限的夾縫中延續着若即若離的政治、經濟聯繫。已有學者指出，對波蘭的外交政策被中國決策層歸列為「與東歐五國關係」範疇，根本上取決於中國自身國家發展戰略與安全戰略的需要，而非特定的雙邊關係^⑤。確切而言，中國此時期對波蘭的政策考量取決於外交上反蘇和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需要。

自中蘇分裂開始，中國一直試圖利用楔子策略分離蘇聯和東歐各國的關係。1971到1975年，中國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方針是：「利用矛盾，各做工作，擴大影響。」1975年，「利用矛盾」被細化為「區別對待，分化小修，打擊蘇修」^⑥，以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被視為「小修」的追隨「蘇修」反華的東歐五國身上。1979年7月17日，胡耀邦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提出要區分蘇修和它的「小夥計」，視情形與後者維持緊張或緩和關係，他認為中國同後者沒有利害衝突，東歐諸國只是緊跟蘇聯反華之調，而反華之舉則「同牀異夢」^⑦。區分對待策略到1980年已然定型。1月，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要求外交人員摒棄「東歐國家屬於蘇聯敵對集團」的觀念，嚴格區別蘇聯與東歐國家，逐步擴大與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⑧。

受到中蘇緊張關係影響，1970年代初，中波關係依舊處於齟齬不斷的狀態。波蘭在續簽兩國科技合作協議問題上反覆無常，北京則將其視為「東歐小修集團之首」。鄧小平於1977年掌握外交決策權後，開始將波蘭視作對莫斯科最具離心力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的「含修量」被重新鑒定並排到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之後^⑨。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波政經關係呈現緩和與鬥爭交錯疊加（間或同時進行）的特徵，中蘇關係及其變化帶來的限制性因素始終阻礙雙方關係的全面發展。儘管如此，較之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對華政策的解凍程度依舊最高，在對華外交接觸和經貿往來方面相比其他東歐國家有着更為頻繁的試探與互動。

1970年代末期，中國在推動中波雙邊外交的議題上更為主動，外交部門不斷借機推動以反蘇統戰為底色的對波交往。波蘭外交部門對此十分清楚，但礙於蘇聯反對，波蘭在對華態度上相對警惕和被動，且時常反覆多變。波蘭外交部門一方面不斷謹慎地嘗試觸探蘇聯的底線，同時在一些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不得不緊跟蘇聯。例如，波蘭媒體對華國鋒1978年引起巨大反響的南斯拉夫之行態度曖昧，卻激烈指責中國於1979年2月發動的對越作戰，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報《人民論壇報》將中國對越作戰喻為希特勒(Adolf Hitler)入侵波蘭^⑩。

中國的聯美反蘇政策使中波關係到1980年仍難以有實質突破。波蘭在柬埔寨、中美聯盟等關鍵問題上與中國對立。2月，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七大至八大通過的報告提出，準備與中國在互利原則下發展國家關係，同時重點批評中國支持柬埔寨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Pol Pot)、實行反蘇的「霸權主義」外交路線是在支持「帝國主義的冷戰」。在中蘇交惡的前提下，

波蘭在對華政策上難有獨立施展空間。7月17日，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雷赫沃夫斯基 (Bogumił Rychłowski) 委婉地告訴黃華，「中蘇關係改善對波蘭實在太重要」^①。

1980年7月波蘭出現罷工後，中國即主張「波蘭應該杜絕一切外國干涉」，實質上反對蘇聯軍事介入，但這並不為波蘭所接納。波蘭認為中國是在尋機破壞波蘇關係和干預其內政。蘇聯則提醒波蘭，中國的聲明是「鱷魚的眼淚」，認為中國在假施同情以謀私利^②。此間，波蘭外交部門一直不滿《人民日報》等中國官方報刊大量轉載西方媒體關於罷工的報導，但其實這只是中國宣傳部門基於區分對待東歐與蘇聯的統戰原則而選擇的策略，為了「不主動輿論介入波蘭國內事務」並「避免給人造成幸災樂禍、煽動罷工的印象」^③。在中波雙方缺乏足夠政治信任的情形下，中國的做法客觀上使波蘭誤認為北京跟西方一起支持罷工。中方雖就此不斷解釋，卻始終未能完全獲得波方諒解。直至1981年2月，中國駐波蘭大使李則望還在向波方強調「〔中國〕有時行動與目標出現偏差」^④。儘管如此，波蘭政府還是在罷工發生期間向中國通報國內態勢，實際上將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等對待。

相比之下，波蘭貿易部門自一開始就積極尋求對華合作。中國外貿部門發現波蘭經濟和科技訪華代表團雖然「迴避政治」，但在科技交流與經貿合作上卻十分主動與誠懇^⑤。中國亦樂意推動雙邊合作，1978年11月，上海展覽館舉辦波蘭出口展覽會，波蘭成為1976年後首個在華舉辦出口展覽的蘇東國家。到1980年末，雙方經濟技術合作擴展到醫療、機械加工、交通運輸等七個領域。需指出的是，蘇東國家並非當時中國現代化規劃所亟需的技術和資金的主要外援來源，中國在對波貿易與技術交流議題上的興趣總體有限。1979年7月，鄧小平提到現代化所需外援主要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第二世界國家」，因為「它們不僅有中國所需的技術等條件，而且簽了合同是算數的」，蘇聯則被認為無力提供援助，且「歷史經驗也證明它靠不住」^⑥。波蘭技術大部分源自蘇聯標準體系，中方認為波蘭出口展覽會上的商品「技術水平一般」，只是對其中部分來自西方的技術抱有興趣^⑦。

對於中國而言，實現現代化並非僅是完成先進技術轉移，長期以來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對國家發展造成的掣肘，到1970年代末已引發幾乎所有層級的決策者反思並尋求解決之道。由於缺乏改革經驗，他們將目光轉向國外。儘管對西方的技術和資本抱有濃厚興趣，黨內卻對借鑒西方國家制度的可行性存在很大疑慮，認為與中國的體制差異過大，所以最初唯有觀察、評估和引鑒較早實行改革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經驗。華國鋒考察南斯拉夫並引入農工商聯合體的嘗試，均說明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體制改革問題上優先借鑒當時被認為是比較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驗^⑧。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治、經濟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中國領導層更加關注蘇東經驗。中共黨史專家何方曾直言1970年代末相關部門的蘇東研究主要是為配合探索改革開放道路，中共高層對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的改革懷有濃厚興趣^⑨。為改變文化大革命以來蘇東國家議題一直處於研究禁區的狀況，1979年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為此開了綠燈。3月12日，鄧力群在國家經委企業管理研究班上發言，認為有必要對比中國和包括蘇聯

在內的外國經驗，從理論上解答有關改革的一系列問題^⑳。5月21日，外交部黨委會議提出要認真研究蘇東社會制度^㉑。當年，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大規模經濟體制改革調研，姚依林在6月27日經濟理論和財經政策研究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調查包括蘇聯、東歐在內的外國發展道路，以便「了解他們有甚麼經驗教訓，有甚麼可取之處」。7月底到8月初，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召開座談會討論改革總體設想，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光分析認為，當時經濟體制改革遇到的三個關鍵問題（集權與分權、計劃與市場、行政辦法與經濟辦法）是中國與蘇東國家共有的^㉒。胡耀邦此時也力圖推動研究工作，9月25日，他在一份關於蘇聯經濟改革的材料上批語「要注意研究，並要拿出成果」^㉓。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前部長朱良回憶，隨着1980年代初蘇東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加速，中國領導層恢復雙方政黨與國家關係的意願更為強烈。交流改革經驗是重要動機，領導層認為一旦蘇東改革成功，對中國來說會「相當有利」^㉔。黃華在一次講話中說得更為明確，他認為蘇東改革早中國數年，因而「有值得學習之處，尤其是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的某些做法值得借鑒」^㉕。

受制於中蘇關係的客觀現實，中國領導人的上述關切並未在1970年代末直接轉化為改善中波關係的動力，但卻讓波蘭這個萬里之遙的東歐小國在雙邊外交關係尚未解凍的狀態下未偏離於北京的視線之外。當波蘭事件這一預示蘇東陣營政經改革遭遇重大變數、並最終將整個體制引向終結的標誌性事件發生時，中國迅速將目光聚焦到波蘭身上。

三 波蘭事件：中國決策層的觀察與思考

中波關係的現狀使中國決策層未能如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那樣直接參與波蘭事件的處理^㉖，雖然波蘭政府在此期間一直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通報其國內情況，但無疑這些信息均為官方立場並具濃厚的宣傳性質，不免片面與主觀。因此，中國決策層在事發之初難以迅速、準確地了解波蘭國內真實狀況。由於思維慣性，他們最初將波蘭事件視為一個有利於反蘇的政治動向。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對波蘭事件的觀察與思考發生變化，不得不再次如1956年那樣，重新思考導致波蘭發生大規模罷工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在同樣為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是否存在。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對波蘭事件的關注聚焦在三個核心問題上：波蘭緣何出現罷工、中國是否會發生類似的罷工，以及要吸取哪些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根據楊繼繩的研究，鄧小平和胡耀邦最初對波蘭事件持積極態度。兩人內部傳達了四點意見：波蘭國內罷工針對蘇聯，因而是正義的；蘇聯不敢出兵；波蘭事件的啟示是必須堅持改革；中國不會發生波蘭事件^㉗。鄧小平此時也並未意識到波蘭事件會對中國產生衝擊。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意圖推動以權力下放和建立適度公眾監督為重心的政治體制改革，他還特意提到要在基層單位推廣和完善具有監督職能的職工代表組織，並在適當範圍

內選舉負責人²⁸。相較之下，陳雲則謹慎得多，他在修改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宣傳工作的匯報提綱時，認為經濟和宣傳搞不好要翻船²⁹。

由於這段時間中國領導人忙於起草和修改第二個歷史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進行高層人事調整，加之9月初波蘭局勢一度平息，波蘭事件暫時未引發中共高層高度關切和深入思考。中宣部15日內部下發的〈關於波蘭罷工事件〉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當時黨內對波蘭事件的認知程度。該文件極為正面地評價了波蘭工人的罷工行動，認為他們在罷工中「比較注意鬥爭策略，比過去幾次罷工顯得更有組織有計劃」。談及波蘭局勢未來趨勢時，文件作出如下判斷：「波工人取得勝利，罷工已於九月初基本結束，短期內不會再有波動，但今後較長時期可能有新動亂。」文件認為波蘭罷工的直接導火線是肉類漲價，根源在於「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具體而言，波蘭1970年開始實行的「高速度、高工資、高福利」政策導致過度舉借外債、盲目引進、經濟比例失衡、通貨膨脹四大問題。同時，波蘭繼承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也出現了如下四個問題：民主權利缺失；腐敗、特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猖獗；工會無法保護工人利益；黨的領導脫離群眾。此外，來自西方的文化和宗教滲透也被認為是觸發罷工的重要外部因素³⁰。由於黨內高層認為中國不會出現波蘭事件，職能部門對波蘭事件的認知還主要停留在分析原因層面；至於中國是否會出現波蘭那樣的罷工，文件則沒有提及。

然而，波蘭局勢一周之後即現轉折。9月22日，團結工會正式成立，新一波罷工高潮掀起。兩天後，一直關注波蘭事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專門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一開始就提到「波蘭事件對我們有重大意義」，並「可能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前途」。胡喬木憂心忡忡地提出幾個自1956年波匈事件以來就已暴露但未徹底解決的事關共產黨穩定執政的問題，包括社會矛盾、政府與人民矛盾、國際因素以及工會和宗教問題。他擔心波蘭事件可能會引發中國國內「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與不滿的工人群眾」結合成「一股巨大力量」，並主張必要之時要對國內可能參與「鬧事」的組織進行教育和打擊。胡喬木提醒黨內領導人注意波蘭事件可能對中國產生的衝擊，建議書記處聯合國務院開會，側重討論國內問題，研究正確辦法並力行之，以便使「他人之禍可以化為我人之福」³¹。

此非胡喬木第一次就改革可能導致的問題向最高領導層建言。作為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早在1979年1月，胡喬木就擔心十一屆三中全會可能招致負面影響，他提醒胡耀邦黨內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股風」，「形勢比1957年還要嚴重」³²。當時胡耀邦否定了胡喬木的看法，並傳達華國鋒嚴禁「反右」的要求。然而1980年9月的情勢已明顯不同於一年前，面對波蘭愈演愈烈的罷工浪潮，胡耀邦不能不慎重考慮胡喬木的意見。

胡耀邦決定在內部刊物上轉載該信，以便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閱研。10月初，中央各機關和政府部門及群眾團體開始內部討論胡喬木的信。宋木文回憶他當時所在的國家出版局黨組的討論情況，提及時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代局長陳翰伯等人起草報告於9日遞交中央書記處，鑒於波蘭事

件的影響，建議貫徹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權益以防止社會中出現抗議事件^③。同日，中宣部也討論了胡喬木的信，部長王任重認為波蘭的教訓值得吸取，中國存在與波蘭相似的問題，任其發展會造成與波蘭類似的後果。中宣部內部同時傳達了陳雲的意見，認為如果不注意宣傳和經濟問題，中國也會發生波蘭事件^④。可見，當時中央各部門已或多或少地開始擔憂波蘭局勢對中國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10月10日前後，胡喬木決定再次推動中央關注波蘭事件。他將外交部一篇題為〈為甚麼匈牙利不發生波蘭式的動亂？〉的內刊文章推薦給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閱讀。該文通過引薦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刊出的一篇關於匈牙利改革的文章，具體介紹匈牙利如何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從而避免發生波蘭那樣的危機^⑤。作為高層決策的親歷者，鄧小平不可能忘記1956年波匈事件給中國帶來的衝擊。儘管10日他在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Robert Muldoon)時還在強調波蘭事件之於反蘇外交的積極作用，但從後來發生的事實看，高層對波蘭事件的看法在這幾天裏出現了明顯轉變^⑥。很快，涉及基層單位群眾組織選舉等議題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被認為不合時宜，圍繞文件的宣傳和討論立刻暫停。為了進一步研究波蘭事件並商討具體應對措施，胡耀邦批准召開國務院和書記處聯席會議。

10月13日和16日上午，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分兩次舉行規模五十人左右的聯席會議，兩次會議均由胡耀邦主持。13日上午的會議討論了波蘭事件的起因，胡耀邦的態度在會後變得十分明確。他在15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自己對波蘭事件的看法：「〔波蘭國內鬧事〕現在是第三次了，我個人的看法是，波蘭黨的領導人嚴重背棄了人民，一個黨由地下黨變成執政黨以後，演了三次悲劇，我覺得也是應當清醒了。」^⑦

第二次聯席會議在16日上午繼續召開，與會者對前述中共高層關注的三個核心問題作了系統分析與總結，最後達成如下共識：首先，波蘭事件教訓深刻，導致事發的三點原因分別是波蘭對外屈服蘇聯、國內經濟政策錯誤、領導層腐敗。其次，中國不會馬上出現波蘭事件，但也並非不可能出現。與會者認為不會出現的因素主要有：中國在外交上與美蘇鬥爭，維護國家獨立和民族利益；粉碎「四人幫」後黨風有所改善；中國的經濟、幹部政策與波蘭差別很大。同時，與會者也總結了可能出現類似波蘭事件的幾點因素：大躍進和文革導致黨的威信下降；當下「左」的思想依舊殘存；過去幾年中央在經濟政策上犯了包括「大幹快上」在內的一系列錯誤；民族、宗教和宣傳工作依舊存在諸多問題。最後，他們總結道：「如果掉以輕心，不總結經驗教訓，重複過去的錯誤，或者不認真做好今後的工作，中國發生那樣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為了防止出現類似波蘭的罷工，他們認為中國未來兩三年內需要完成發展經濟和整頓黨風這兩項任務，並認為這正是波蘭事件給中國帶來的教訓^⑧。

至此，中共高層對波蘭事件的看法相比兩個月之前已然迥異，即從把波蘭事件視為純粹的反蘇外交事件並認為中國不會出現類似問題，到認為中國可能出現波蘭事件並要吸取教訓和採取措施。

四 震盪波：波蘭事件在中國社會引發的震動

中共高層的態度在10月15日前後轉變並非偶然。在此前後，國內多所高校和工廠爆發一系列罷課、罷工、上訪、遊行以及組織獨立工會和學生聯合會事件，這些與波蘭類似的抗議事件分布在四川、上海、黑龍江、遼寧、湖北等二十多個省市，在成都、上海、哈爾濱、瀋陽、太原、武漢、北京等幾個城市尤為突出^⑳。

10月中旬，一系列抗議事件在四川數所高校集中發生。15日，四川農學院發生食堂炊事員毆打學生事件，進而引爆該校學生因伙食供應質量長期低劣而積壓的不滿情緒，最終釀成全校罷課^㉑。西南交通大學師生因質疑校園存在輻射污染、體檢不嚴格等問題而要求遷址，在反覆要求得不到有效回應後，教工和學生自發組織起來進行罷課罷教，整個抗議行動持續一個多月^㉒。幾乎與此同時，成都科技大學的學生因學校隸屬關係問題而集體上訪，並且持續了數周時間^㉓。

上海的抗議事件主要發生在基層街道的工廠和學校。9月初，上海一些小廠和個別商店零星發生多起怠工罷工事件。10月中旬前後，此類事件陸續增多。這些工廠由於體制問題導致的內部人事、待遇糾紛較多，職工和部分管理幹部因為獎金分配、生產定額、幹部處理等原因罷工和怠工^㉔。此外，一些街道學校的問題也不少，10月19日到28日，上海市業餘工業大學輕工分校的學生就因校名問題連續罷課十天^㉕。

以罷工、罷課為主的抗議活動自10月中旬後在其他主要城市陸續出現，東北地區此類現象主要集中在哈爾濱、瀋陽、牡丹江等市的工廠企業內。30日早晨，哈爾濱第二工具廠近二十名工人因住房問題到市信訪局上訪；同時，該市酒精廠三名工人因工資未得到上調而絕食抗議。哈爾濱南崗公安分局自10月下旬開始不斷被上訪的工人堵門口，僅26日一天就有六十多名工人上訪，起因是該局非法拘留工人致死^㉖。

1980年國內媒體的開放度相比1956年有大幅提升，《人民日報》等媒體自8月開始持續報導波蘭事件，公眾有足夠多的機會了解波蘭國內情況。從這段時間參與罷工、罷課等抗議事件的學生和工人的言行來看，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受到波蘭事件的影響後，借用該事件向政府施壓或直接模仿波蘭團結工會。12月初，中宣部總結過去一段時期地方高校和工廠中出現的上訪、罷課、遊行等現象，提到「個別工廠工人乃至工會幹部公開提出要拋棄現在的工會，成立獨立工會」^㉗，前述各地的具體情況也說明了這點。西南交大的師生模仿波蘭團結工會，成立獨立自治的「罷課聯盟」^㉘。哈爾濱第二工具廠的工人在訴求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對接待人員表示：「你們知不知道波蘭事件後我們工人都在想甚麼，我們的問題你們不給解決不行。」^㉙上海橫浜街道汽車修理廠的一些青年工人讚揚「波蘭工人罷工就是好，獨立工會能為工人說話辦事，他們敢於向不關心工人痛癢的執政者進行鬥爭」，抱怨「中國工會等於虛設」，並表示如果工會不能為他們這些「政治地位低、福利待遇差、勞動條件艱苦」的街道工人爭取權益的話，他們就準備退出工會。上海紡織機械公司所屬機配件三廠工人因不滿新辦集體企業的工資政策，向廠方威脅要成立獨立

工會鬥爭，更為激進的工人乾脆直接說：「如果再不解決，就要爆發波蘭事件，要把鍋爐房炸了。」^④

總體上，9月後全國各地出現的罷工、罷課等活動雖然遍及各主要省市，但就參與人數和持續時間而言，其規模依舊有限，幾乎不可能形成類似波蘭那樣全國範圍內跨行業、有組織的大規模抗議運動。例如，北京在整個秋季發生的抗議事件約二三十起^⑤，粗略估算參與者約數百人，而當時北京的總人口近千萬。即便如此，這些抗議事件依舊引起各級幹部的高度關注。

以罷課、罷工、上訪為主的抗議活動讓不少基層管理部門乃至省市機關幹部倍感壓力。他們認為抗議事件大多是受到波蘭罷工影響，擔心波蘭事件在國內可能會進一步誘發類似的抗議風潮，其中尤以成都、上海的幹部想法最為典型。接連不斷的大學罷課事件在四川省級機關和成都市機關的一些幹部中引發強烈反應。他們認為學生鬧事的源頭是歷史遺留問題未徹底解決，同時也是受到波蘭事件影響，因為「〔學生的〕做法手段都與波蘭相似」。他們擔心學生鬧事會同當前社會上已有的就業、工資、物價三大矛盾攪在一起，最後出大亂子，不少人因而對前景感到憂心忡忡。參加四川省、地、市、州委宣傳部長座談會的一些幹部認為，鑒於「國內財政困難，歷史欠賬太多，外部國際形勢動亂，加之波蘭事件的影響」，決不能把四川或其他省市出現的學生鬧事看成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掉以輕心」，因為「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有不少是由學生罷課、上街遊行示威開始的」^⑥。他們認為波蘭事件是可以報導的，但是宣傳過多就會產生副作用。上海市的管理部門分析本市罷工、罷課活動的原因時認為，波蘭事件是除了物價等內部因素之外的一個重要外因。他們認為儘管目前罷工、罷課的規模很小，造成的損失不大，但「已經在一些企業中產生不良影響」，尤其是「那些有關波蘭工會罷工的新聞報導對青年職工有一定影響」^⑦。

黨內幹部對各地抗議事件背後原因的分析存有一些共同點，即認為波蘭事件是外部因素，而當時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所遭遇的與波蘭十分類似的改革問題，被視作抗議事件發生的最根本原因，這些問題被認為會在外因素催化下迅速發酵。在10月13日和16日的聯席會議上，中共高層已達成共識，認為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存在着與波蘭十分類似的改革困境，尤其是物價過快上漲、經濟結構失衡、外債暴增、宗教和國內異見思潮等，並認為「目前矛盾還在暴露中」^⑧。實際情況確實如此，當時中國社會各個方面（尤其是經濟和思潮）顯露出與波蘭十分類似的弊病，很多問題愈來愈嚴重。

五 震動背後：中波遭遇相似的改革問題

波蘭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以豬肉為代表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過快上漲。在過去五年中，波蘭國內物價已處於持續快速上漲狀態。據統計，該國1976到1980年的年均通脹率為6.7%，1980年更高達8.5%^⑨。在彼時的中國，改革開放階段的第一波漲價潮已於1979年悄然掀起，並在1980年愈演愈烈。與波蘭十分相似的是，漲價的主要是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日用品等。

全國範圍的漲價一出現便來勢洶洶，1980年新年之後變相進入暗漲階段。二十八個城市第一季度市場零售價指數較去年上漲6.4%，高踞漲幅前兩位的重慶和成都分別為9.6%和9.4%。各類商品中，新鮮蔬菜漲幅最大，全國二十九個大中城市第一季度均價比上年同期上漲19.1%。部分城市漲幅驚人，長沙與合肥分別達75.8%、87.9%^⑤。多數城市物價在第二季度後愈漲愈烈。北京市上半年蔬菜零售價比去年同期上漲30%多，武漢則高達54.32%。湖南前八個月國營菜店綜合平均零售價上漲超過30%；10月後，杭州等部分城市物價開始失控；哈爾濱市超過六成商店不顧政策哄抬物價^⑥。當年，《人民日報》宣布全國商品價格上漲6%，副食品漲13.8%^⑦。

1980年的物價上漲幅度和波及範圍雖不及1985年後全國範圍的漲價風，但對於長期習慣計劃價格且收入一直停滯的廣大民眾而言，這波通脹帶來強烈的生活與心理衝擊。福州很多家庭由於物價上漲而處於「有月頭錢，沒月尾錢」的狀態；南京不少職工已吃不起肉；蘭州居民發現只有郵資未漲價；成都一大批幹部抱怨「漲價不是八種，而是八十種，八百種」。收入相對較低的黨政、文教、科研部門幹部直呼「實在入不敷出」；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因為物價問題抱怨改革開放後「生活福利如破瓶盛油日日少」^⑧。

物價快速上漲迫使政府出面干預，地方政府針對物價的財政補貼從去年的570萬增至2,000萬，趙紫陽於11月21日要求北京市實行限價^⑨。前述抗議事件較為集中的成都、武漢地區物價上漲均相對突出。面對漲價潮，不少民眾聯想到波蘭事件，瀋陽市總工會就物價問題訪談百多名市民，發現「有的人把物價上漲與波蘭事件聯繫起來，認為物價繼續上漲就孕育着危險後果」^⑩。

1980年漲價的直接誘因是社會商品需求大於商品供應，此外亦不乏包括物資調配、商品議價改革在內的一系列具體因素，但最為關鍵的是長期以來計劃體制下的價值背離。就深層次的經濟結構而言，1980年的漲價潮實際上是國民經濟在價格機制上形成的比例失衡經歷長年累月累積後爆發的結果。在這個問題上，波蘭與中國的情況極為相似。

波蘭在二戰結束後模仿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到1970年代後期已陷入工農業結構比例嚴重失衡的困境，其表徵是農業生產大幅衰退。波蘭農業生產總值自1972年後整體呈現下跌趨勢，1975到1980年間便曾三次下降，1980年降幅達到10.7%。波蘭的穀物和飼料進口量十年內從250萬噸增至772萬噸^⑪。1949年後中國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並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實現工業化，工農業等國民經濟重要部門比例長期嚴重失衡，到1970年代經濟陷入「高速低效、高投入低產出、高積累低消費」的困局^⑫。文革後，尤其是自1978年開始，一系列經濟調整政策在糾正國民經濟結構比例失衡上的效果喜憂參半。1979年前後的農輕重比例、工業門類比例以及積累與消費比例均不正常，部分經濟結構比例失衡反而加劇。農業發展滯後使中國在1970年代後期成為糧食進口國，1977到1980年，中國累計進口糧食近4,200萬噸^⑬。

此時，中國和波蘭均面臨着從西方大規模引進技術和設備而導致的外債暴漲困境。1970年代後半期，為應對經濟衰退，波蘭統一工人黨試圖通過從西方引進大量技術和資金刺激經濟發展，卻無法在落後的生產與管理體制下形成應有的經濟效益。期間，波蘭從西方的進口價值增加五倍，但出口價值

上漲不足四倍。引進政策非但未能挽救經濟頹勢，反而使國家欠下巨額外債，波蘭的外債總規模從1960年代的3億美元增加到1979年末的180億美元。1980年，波蘭外債達到230億美元，超過蘇聯，位居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國家之首。由於大部分外債屬於高息國際商業借貸，波蘭政府債務本息償還量在十年內增加二十倍^④。

中國在1970年代後期大規模從西方引進技術和設備的做法很大程度重蹈波蘭覆轍。為加速現代化，中共中央於1978年決定從西方引進總值78億美元的二十二個成套項目；引進規模史無前例，1978年實際進口45.2億美元^⑤。引進項目多數屬於重工業領域，結果不僅使本應縮減的基本建設規模擴大，並且進一步加劇國民經濟結構比例失衡。由於項目費用均通過國際商貸支付，當1980年開始償貸時，中國政府發現高額利率使債務本息量逼近償還能力極限。中國1980年對外負債35.6億美元，其中30.4億美元用於償付商貸；還債壓力之大迫使中共中央考慮動用儲備黃金^⑥。

中國引進的項目從一開始就問題不斷。項目引進決策是在缺乏前期可行性研究和計劃書的情況下以「領導畫圈」的方式匆忙完成，由此造成選址不合理、配套跟不上等諸多問題。諸如，寶鋼項目規模達幾十億元(人民幣，下同)，但項目概算到1980年也未確定；四個大型化肥生產項目因選址錯誤，面臨缺油缺氣的困境。總體而言，各類項目實際引進的規模完全超過國家財力物力極限。到1980年，債務加上經濟效益不佳已讓中央深感騎虎難下，當年被迫緩建或削減其中十四個項目^⑦。此時，中共高層已意識到在引進問題上犯了與波蘭同樣的錯誤。10月20日，李先念告訴來訪的南斯拉夫代表團，中國經濟政策出現重大失誤，他憂心忡忡地說道：「波蘭有200億美元外債，他們必須拿70-80%的外匯償還，中國現在面臨相同的問題。」^⑧

經濟結構比例失衡、農業生產滯後加上外債高築，其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收支失衡。在貨幣供需失衡加上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體制雖能通過控制商品價格長期壓制通脹，然而一旦遭遇價格機制改革，通脹便會集中爆發，波蘭就屬於這一狀況。中國的具體情況有所差異，但也存在着外債陡增情況下財政收支和貨幣供需失衡進而導致通脹的問題。

中央政府長期維持的財政平衡到1970年代後期難以為繼。1977年政府財政盈餘尚有30.93億元，1978年收窄到7.12億元，1979年赤字達到了驚人的170億元^⑨。面對不斷增加的財政虧空，作為非生產性機構的政府只能通過增發貨幣解決債務問題。1979到1980年，人民銀行增發126億元貨幣。為此，趙紫陽在1980年11月15日提醒黨內「大好形勢下存在潛在風險」，他估計明年可能還要增發90億元。如此，三年累計增發200多億元，等於1978年以前全部貨幣發行量，已觸及國民經濟所能承受之極限。此時，趙紫陽想到了波蘭，他擔憂地提到：「東歐有的國家，就是因為基本建設攤子大，積累率高，消費也高，維持不了，就靠多發票子，多借外債，最後導致群眾起來鬧事，出大亂子。」^⑩

外國宗教和國內反對派力量是波蘭出現罷工的另外兩點關鍵因素。波蘭社會具有悠久的宗教傳統，天主教會在戰後共產黨執政時期依舊具有影響力並介入波蘭國內歷次危機。1978年10月波蘭克拉夫科市的樞機主教沃伊蒂瓦

(Karol Wojtyła) 被加冕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被視為波蘭國家英雄和精神領袖，天主教會波蘭國家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陡升。1979年6月教宗的波蘭之行更是讓世人看到共產黨當局在與天主教會的人心爭奪戰上徹底失敗。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波蘭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反對派力量。由於欠下西方大量債務，波蘭政府對反對派投鼠忌器，以勞工保護委員會為主的反對派在1970年代後期迅速成長，團結工會很大程度上受其影響與支持^①。

在對外打開國門後，1970年代末期中國國內的宗教活動開始在外國教會影響下復燃。根據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調查，1979到1980年，浙江等九省的基督教「成倍、十幾倍」地發展，河北等八省的天主教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他們發現「全國信教青年幾百萬，各地地下教會復蘇」，部分地方已出現「教會鬧事」^②。如果說宗教的影響尚處萌芽狀態，那麼1970年代末黨內和社會上的異議思想和群體則更有形成反對派的可能。

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使毛澤東的功過評價成了遍及街頭巷尾的重要話題。當時黨內不少中高級幹部對毛的評價極為負面。1980年9月，鄧小平藉會見意大利記者之機提出毛「功績第一，錯誤第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要永遠掛下去」的看法^③。此話隨即在黨內激起不少反對聲音，有幹部認為毛在文革中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認為鄧將毛的錯誤簡單化的做法「不能服人」^④。上海一部分幹部公開認同毛「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的觀點^⑤。在接下來圍繞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大討論中，黨內大批中高級幹部指責毛建國後「帝王做派」、「家天下」、「品行不一」，等等，不少人要求放棄毛澤東思想^⑥。此種情況一度引起胡喬木擔憂，他曾就此寫信給胡耀邦，提醒黨內思想問題會逐漸形成一股思潮，並可能「與某種黨外思潮相結合」^⑦。

胡喬木信中所言「黨外思潮」，主要指1978年開始形成的以「西單民主牆」和各類「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為代表的改革開放時期第一波民主化思潮。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對此高度戒備並採取強制措施，致使民主化思潮到1980年下半年開始消退。民主化思潮的影響範圍主要限於知識份子、學生和城市市民，但就全國範圍而言，孕育大規模異議群體的條件卻在不斷增強。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廣大普羅民眾因長期積累的各種問題而對共產黨、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認同急劇負面化，尤其是年輕人因教育和就業等問題而成為異議主流。1980年10月，中宣部調查發現，在向來被認為有革命傳統的陝西，只有30%的受訪者認為毛澤東功大於過，其餘或完全否定，或沉默不語。其中，持完全否定態度的多數是青年學生，他們中的很多人因文革而對社會主義制度持怨恨情緒，並對國家未來悲觀失望^⑧。無論是規模還是組織性，當時中國的異議群體均無法與波蘭相比，但這種傾向匯合前述各種因素，不得不令中共高層擔憂。

六 波蘭事件陰影之下的改革調整

不斷湧現的罷工、罷課等抗議事件，加上當時國內經濟和政治領域出現與波蘭高度相似的危機，促使中共高層在外交、經濟和政治方面作出重大

調整。在中國就波蘭事件採取的所有應對中，外交方面的措施最為明顯與直接。

到1980年底，中波關係已有解凍迹象，波蘭在聯合國大會討論涉及中國核心安全利益的柬埔寨問題時，並未與其他蘇東國家一起攻擊中國^⑨。可以說，波蘭已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擺出了新的友好姿態。考慮到1980年波蘭的罷工最初是由豬肉漲價引發，且此後豬肉供應依舊緊張，中國決定向波蘭援助凍豬肉，幫助其穩定國內物價以抑制抗議活動的進一步蔓延。不久，兩國政府簽訂關於中國以十年期無息貸款方式向波蘭提供豬肉的協定。在當時援外政策全面收緊的情形下，這項協定顯得十分特殊。與同時期其他外貿出口工作相比，向波蘭供應豬肉的經濟回報並非首要考慮，中方內部主要將這項工作視為「政治性很強的任務」。為落實上述協定，1981年10月21日，中國糧油食品出口總公司與波蘭安尼曼克斯(ANIMEX)畜產品進出口公司簽訂供應50,000噸凍豬肉的合同。為了幫助波蘭在聖誕節期間穩定市場供應，中方不顧當時豬瘟導致豬肉供應緊張，決定在聖誕節前向波蘭供貨，第一批2,000噸豬肉於11月10日緊急裝船發貨^⑩。

與此同時，中方在國內報導和宣傳波蘭事件的策略出現了微妙的轉變。1980年11月，中宣部召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鑒於波蘭的教訓，中宣部決定採取措施加強宣傳工作^⑪。12月初，中宣部一邊要求媒體以客觀態度適當增加對東歐五國政治、經濟情況的報導，但同時也叮囑對波蘭、匈牙利的報導不宜突出^⑫。波蘭事件發生後，國內研究人員曾結合波蘭事件，重新探討1956年匈牙利事件並準備公開發表文章，但不久便被中宣部叫停。中宣部要求在中央沒有新結論前，任何報刊都不能公開重新評價匈牙利事件^⑬。

在波蘭事件的陰影之下，經濟政策調整的幅度和速度從10月開始明顯提升，並在1980年末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緊急剎車。總體而言，這次經濟調整大致延續了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確定的方向，其背後的原因與動機十分複雜。根據現有資料分析，可以認為前述經濟領域內的一系列問題加上波蘭事件造成的鏡像作用，最終成為年底經濟改革急剎車的重要原因之一。

陳雲一直對波蘭事件保持高度關注，並主張吸取波蘭的經驗教訓。自1978年以來，他在經濟改革問題上一直主張「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基本思路。陳雲並不否定改革開放，而是主張在穩定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包括實現計劃主體之下的物資供應平衡、財政和信貸平衡、經濟比例合理化等；尤其是在利用外資問題上，他的態度十分謹慎。1980年開始，陳雲在經濟決策上的話語權不斷增加。在10月16日討論波蘭事件的國務院聯席會議上，陳雲的經濟路線被認為是正確的，胡耀邦等人要求學習即將出版的《陳雲同志文稿選編》^⑭。

陳雲主張必須在1981年實現財政與信貸平衡，為此寧可放棄速度；縮減基本建設規模成為最核心的調整內容。國務院和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陳雲的意見調整了經濟計劃，並提交到11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陳雲在會上主張「搞鐵公雞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後生」，經濟方面「左的東西」要清理。鄧小平完全贊同陳雲，他建議「要考慮退得夠不夠，不夠要延緩時間，三年能緩過來就不錯了」。最終，5、6月間制訂的5%到6%的經濟年增速被調低到4%^⑮。

在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下，陳雲關於經濟改革的主張在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成為主流。陳雲在會上提出關於經濟調整的十四點意見，核心是「改革步子要穩，某些方面要退夠」^⑤。趙紫陽隨之宣布具體方案，基於實現財政與信貸收支平衡和控制物價這三個目標，規定1981年財政支出減少140億元，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1980年的241億元減少到170億元，全國基建總規模由500億元減少到300億元^⑥。中央工作會議最後確定了二十四字調整方針：「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⑦。

就經濟方針而言，中央工作會議確定的調整方案並非之前一系列調整政策的力度和幅度在量變層面上的提升，它實際上意味着中共高層改變了在發展與穩定兩者關係上的認知。1981年，一系列直接反映對外開放程度的經濟指標斷崖式下降，其中最主要的是技術、設備和資本引進規模。1973到1982年，中國從西方引進的技術和設備價值計101.87億美元。1978年是歷年的最高點，1981年的數額直接從上年的12.66億美元下跌到1.43億美元，略微超過1976年的1.2億美元，甚至低於1975年的1.83億美元^⑧。在陳雲的堅持下，利用外資的規模也大幅減少。1981年7月，中央指示各地要在積極穩妥的方針下，量力而行、循序漸進地把引進外資的工作納入到國民經濟計劃，同時要「做好綜合平衡，考慮償還能力」。中共中央規定債務的償還額要控制在當年可用外匯的20%以內，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控制在15%以內。關於今後十年利用外資的規模，中共中央原計劃「六五」（1981-1985）和「七五」（1986-1990）期間分別為160億美元和200億美元，經過調整，「六五」期間的規模減為約100億美元和120億美元高低兩個方案^⑨。

中央工作會議同時也在政治、思想上作出調整。鄧小平在會議上着重談論政治改革方面的問題。他要求在意識形態方面加強管控，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完成這次大調整的關鍵是要對任何企圖削弱和反對黨領導的行為進行批評教育乃至必要鬥爭。鄧認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需要繼續進行，但「方法要細、步驟要穩」^⑩。從鄧這次講話的內容看，他關於黨和國家制度改革的程度和範圍已完全退縮到行政改革層面，即防止權力過份集中、實行黨政分開的原則、改良幹部選拔體制、提高行政部門效率。同1956年波匈事件後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態度類似，鄧強調要做好思想宣傳工作，斷定黨的整個思想政治工作已經成為實現這次調整、保證安定團結局面的一項極端重大的任務。鄧再次強調毛澤東功績是第一位的，而基層群眾組織選舉的問題不再被提及。

在對待全國各地抗議的問題上，鄧小平的言談反映出他也有了幾乎與胡喬木相同的顧慮，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從中也可以更明確地看到，波蘭事件給中共高層領導人在改革開放決策上造成的鏡像作用。鄧認為前段時間各地出現的「鬧事問題」，包括成立非法組織和發行非法刊物等行為，都是「文革殘餘勢力在借用民主法治的名義在搞破壞」。在這裏，階級鬥爭的提法重新出現。鄧認為目前階級鬥爭雖非主流，但依舊存在，且不可小覷。為了保證安定團結局面，他建議國家機關通過立法對罷工、罷課、遊行、示威進行管理，並禁止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他認為對一些嚴重的破壞活動要多次打擊，有些「鬧事」嚴重的地方，在慎重考慮的基礎上，可採取戒嚴和出

動部隊等方法維穩^②。鄧雖然沒有在講話中直接提到波蘭事件的影響，但從後來情況來看，這段話明顯是針對波蘭事件而說的。

從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可見，中共高層在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問題上已經發生轉折，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回到了「體制首重，發展次之」的模式。會議結束當天，鄧的講話被下發到縣團級基層單位學習和貫徹，隨講話稿被同時下發的還有一份中宣部起草的〈波蘭罷工事件的教訓〉。該文用很長篇幅回顧了波蘭罷工事件的經過，沿用了中宣部此前下發的〈關於波蘭罷工事件〉的觀點分析波蘭事件發生的政治、經濟原因和外部因素。至於波蘭事件的教訓，文件轉述了鄧關於國內「鬧事」事件的立場，即對「少數人熱衷於獨立的工會、學生會和社團」的現象作出敵我定性，認為這是「企圖擺脫黨的領導並且反黨反社會的反革命份子在借用民主的口號搞破壞」。最後，該文頗有意味地指出：「認為中國也應該學習波蘭團結工會做法的認識是錯誤的，這是對波蘭和中國的情況都做了錯誤了解的結果。」^③

七 結語

相比1956年波匈事件，無論是波及範圍還是持續時間，1980年波蘭事件對中國的影響相對有限。如果說1956年波蘭事發時，中國決策層面臨的是要解決往哪裏走的問題，那麼1980年波蘭事件爆發之際，他們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在確定國家總體發展方向後如何探索具體的改革路徑。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方向已在1978年確定，1980年改革開放路徑發生的變奏，就其本身而言，並非一個具備完整歷史轉折意義的標誌點。促使變奏成為現實的基礎條件是自1978年以來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領域內業已發生的變化，波蘭事件作為外部因素加速了整體進度，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此後改革開放基本特徵的凝化。也正因如此，有關波蘭事件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影響的準確評估變得困難。

儘管如此，如果將波蘭事件與中國改革開放之間的互動視為全球冷戰體系的一個內在環節，那麼它就具備了非凡的歷史意義。1980年代是冷戰最後的十年，政治、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使中國由全面自我封閉的狀態逐步走向與世界交聯共生，在此過程中，隨着內部制度改革全面開啟，中國正式成為全面變革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造成的影響是全球性的，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並產生持續至今的影響。就本文所討論的主題而言，改革開放使得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成為全球現象。社會主義陣營雖早已分裂，此時中蘇這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早已淪為惡敵，且1980年代的中國在外交戰略層面開始逐步退出冷戰。但就冷戰作為兩種異質制度對抗的本質而言，全球範圍內的制度性分野與對立在1980年依舊存在並且強化。本文所探討的波蘭事件與中國改革開放的互動關係說明，在中國與蘇東國家政治外交對立、經濟文化交流有限的情形之下，圍繞改革形成的制度鏡像事實上促成了制度維度一方的生成。換言之，取代有形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聯盟，基於同質制度共情的國際鏡像的形成及其持續作用，一個隱現的社會主義共同體在冷戰最後十年持續存在。

1980年圍繞波蘭事件的各種認知和應對，可以說是此後十年中國在改革和開放進程中對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鏡鑒的預演。1981年，波蘭事件已演化為波蘭黨內不同派別的鬥爭，中國外交部門間或慶幸波蘭局勢對蘇聯全球戰略造成的牽制^④。但是，高層決策者對波蘭局勢的聚焦已然不在反蘇層面。此後十年，他們腦中縈繞的始終是基於制度共情的鏡像觀念。

1981年3月22日，趙紫陽對外賓談及1980年代國際形勢會更動盪、緊張、複雜與多變，因為「不知哪天會出事，柬埔寨、阿富汗、兩伊戰爭和波蘭都說明這個問題」^⑤。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理政者，中國總理在為波蘭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擔憂之際，實際上更多地將波蘭的改革及其教訓視為一種制度鏡像，並且具體化為中國自身改革開放政策的度量標準。8月初，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聽取財政部匯報時，提到菲律賓借外債120億美元，波蘭也借了200億美元外債，認為「我們當然不能這樣搞」。隨着1980年代中期以後波蘭事態的跌宕起伏，趙紫陽在技術引進、經濟增長速度、基本建設投資、物價等政策的制訂和執行中，數次直接或間接地提及要鏡鑒波蘭^⑥。

除了經濟政策，中國領導層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對波蘭事件的鏡像效應也在持續。1983年1月，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召開，與會者的共鳴是「波蘭的經驗很值得借鑒」^⑦。可以說，反覆出現的生動而現實的鏡像表明，政治改革的限度已經被明確界定。對快速發展與體制穩定的精確衡量已經成為決策思維模式之一。1981年8月18日，李先念在會見巴基斯坦廣播電視代表團時所講的那段話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他借分析波蘭國內問題根源之機，強調中國還在總結經驗謀求發展，但問題是「〔發展〕要到甚麼程度」^⑧。

不得不提的是，1980年代中國改革的制度鏡像所參照的最重要對象還是蘇聯。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次，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並推出新思維改革。3月13日到14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蘇聯改革動向，萬里的意見最具代表性：「對比與其他國家的改革，對中國沒有壞處。」^⑨蘇聯的新政策對中國領導層產生了巨大影響，儘管當時兩國關係還處於解凍前夜。

總體上看，無論是相對於西方還是蘇東集團，1980年代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依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中國在外交、經濟、科技方面更多面向以美國為首的冷戰一方，但在制度改革層面，它卻與蘇東國家集團產生共情並視為鏡像借鑒。可以說，在改革與開放的問題上，中國跨越並聯結了兩大陣營。從結果上來看，這使得中國在當時的全球冷戰格局之下獲得了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也是它最後經受住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帶來的巨大衝擊，在保持國家制度完整和社會經濟穩定的狀態之下，較為安穩地跨過冷戰的歷史界限、進入後冷戰時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隨着冷戰結束，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等事件的推動下，又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通道，但是來自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鏡像效應依舊發揮着作用。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改革開放本質上是一項在諸多維度的國際國內互動中不斷變奏的發展規劃，在這一過程中，圍繞政治、經濟等諸方面改革問題的鏡像借鑒在所難免。關鍵在於，如何讓這種鏡像轉換為推動改革和開放永續的助益因素，而非阻礙因素。這需要歷史研究者更多地考察與波蘭事件類似的個案。

註釋

- ① 本文所使用的冷戰概念具體來自歷史學家羅麥羅的界定，即「冷戰為一種由各類迥異的來自本土、國家、跨國和全球層面的互動因素構成的複雜編織，它包含各類在諸多相交叉領域內活動的行為體及各種時常混合的解釋範式」。參見Federico Romero, “Cold War Historiography at the Crossroads”, *Cold War History* 14, issue 4 (2014): 687。本文所討論的制度鏡像發生於中波兩國間，是多維冷戰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 ② 關於波匈事件對中國影響的研究，參見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③ 毛澤東去世後，中共高層有目的地全面借鑒蘇東經驗推動改革的做法始於華國鋒。1978年，他訪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主要是為了學習改革經驗。參見“Report on the Visit of the First CCP Study Delegation to the Socialist Federative Republic of Yugoslavia” (10-31 March 1978), National Archive of Serbia, AJ CK SKJ 507/IX 60/I 77。
- ④ 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頁221-22；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頁368-69；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頁32-35；Margaret K. Gnoinska, “‘Socialist Friends Should Help Each Other in Crises’: Sino-Polish Relations within the Cold War Dynamics, 1980-1987”, *Cold War History* 17, issue 2 (2017): 143-59; Jeanne L. Wilson, “‘The Polish Lesson’: China and Poland 1980-199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 no. 3-4 (1990): 259-79。
- ⑤ 牛軍：〈從「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國對「東歐五國」政策〉，《外交評論》，2013年第5期，頁65-81。
- ⑥ 〈東歐工作座談會〉（1977年9月5日），載《郝汀工作筆記》，未刊。本文所引未註明具體館藏信息的檔案文件、個人日記和手稿，均為筆者私人收藏，下引不再另註。
- ⑦⑧ 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頁118-19；88-89。
- ⑧⑨ 黃華：〈1980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任務〉（1980年1月25日）。
- ⑨ 〈東歐工作座談會〉。
- ⑩⑪ 中聯部六局：《中波兩黨關係大事記（1949年9月—1984年12月）》（內部資料，出版時間不詳），頁91-92；95-99。
- ⑫ “Secret Telegram No. 3267/IV Sent from Beijing to Warsaw” (11 December 1980), Archive of Modern Records, Warsaw (AAN), KC PZPR, XIA/1273,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ID: 113330; “Secret Telegram No. 3638/IV Sent from Moscow to Warsaw” (18 December 1980), AAN, KC PZPR, XIA/1273,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ID: 113331.
- ⑬ 中聯部六局：《中波兩黨關係大事記（1949年9月—1984年12月）》，頁95-99；中宣部：〈關於波蘭罷工事件〉（1980年9月15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8-39，頁2-6。
- ⑭ J. Wiejasz, “Not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oland” (13 February 1981),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Warsaw (IPN), BU MSW II 2882;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ID: 113332.
- ⑮ 上海市革委會：〈接待波蘭科技代表團情況簡報〉（1978年3月15日），上海市檔案館，B32-2-272，頁42；上海市外辦：〈接待波蘭科技合作代表團情況簡報〉（1982年12月3日），上海市檔案館，B32-2-200，頁135。
- ⑯ 鄧小平將美國列為第二世界國家，是因為當時中共高層對三個世界理論的看法發生改變。參見鄧小平：〈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1979年7月7日），載《趙政一大使工作日記（1979）》，頁49。
- ⑰ 上海市接待波蘭機械展覽會辦公室：〈關於接待波蘭機械展覽會情況的報告〉（1978年12月23日），上海市檔案館，B70-3-570，頁57。

- ⑱ 劉艷：〈農工商聯合企業的回顧與思考(1978-1983)〉，《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5期，頁71-82。
- ⑲⑳ 何方：〈改革開放後的研究所〉(內部資料，出版時間不詳)，頁21。
- ㉑ 鄧力群：〈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1979年3月12日)，載《鄧力群文集》，第一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89-222。
- ㉒ 〈部黨組會議紀要〉(1979年5月21日)，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檔案室，WD-8，頁52。
- ㉓ 房維中主編：《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9年卷)》(內部資料，2004)，頁88、95。
- ㉔ 何方：《何方談毛澤東外交》(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頁429。
- ㉕ 中聯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上冊(內部資料，2004)，頁52。
- ㉖ 沈志華：〈1956年10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119-43。
- ㉗⑳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222。
- ㉙ 〈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0年8月18日)。
- ㉚㉛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頁178；245。
- ㉜ 中宣部：〈關於波蘭罷工事件〉，頁2-6。
- ㉝ 胡喬木：〈致胡耀邦〉(1980年9月24日)，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287-89。
- ㉞ 宋木文：〈為吳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點補正〉，《文匯讀書周報》，2010年7月23日，第5版；陳翰伯：〈如何保障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載《陳翰伯文集》編輯組編：《陳翰伯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165-68；宋木文：〈陳翰伯同志對出版領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重大貢獻〉，載《宋木文出版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頁59-60。
- ㉟ 〈鄧小平副主席、趙紫陽總理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的談話〉(1980年10月10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5-17，頁65-77。根據筆者訪談，鄧小平曾在家中與胡耀邦等人專門討論波蘭問題，具體細節迄今未公布。
- ㊱ 〈胡耀邦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0年10月15日)，湖北省檔案館，SZ1-8-177，頁12。
- ㊲⑳㉓ 〈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第54號)〉(1980年10月16日)。
- ㊴ 武漢、太原、北京的情況，參見“Peking Magazine Says Students and Workers Have Staged Disorders”，*The New York Times*, 14 April 1981, A5；“Chinese Try to Form Free Trade Unions”，*The Times*, 30 January 1981；“Polish Example Affects Chinese Workers”，*The Times*, 5 March 1981；Michael Weisskopf, “Chinese Official Confirms Reports of Labor Unrest”，*The Washington Post*, 30 April 1981, A30。
- ㊵ 〈四川農學院關於學生罷課的情況簡報〉(1980年11月20日)。
- ㊶ 西南交大為原唐山鐵道學院，1964年後因備戰需要遷至四川省眉縣。西南交大校委：〈學生罷課情況簡報(六、八、九、十四)〉(1980年10月22日至11月5日)。
- ㊷ 成都科技大學團委：〈學生動態反映〉(1980年11月4日)。
- ㊸ 目前可知問題較多的有加興街道新亞服裝廠、吳松街道時代服裝廠、東長治街道長征服裝廠和橫浜街道汽車修理廠等。參見上海市集體事業辦公室：〈關於上海市虹口區三個街道工廠部分職工怠工、罷工事件的補充報告〉(1980年11月2日)，上海市檔案館，B1-9-262，頁59。
- ㊹ 上海市高教局：〈關於處理上海市業餘工大輕工分校學生罷課事件的情況報告〉(1981年2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B158-4-386，頁97。
- ㊺㊻ 康偉中：〈波蘭事件後在哈爾濱等市一些工人中出現的新動向〉，《內部參考》，第97期(1980年11月24日)，頁15-16。

- ④⑥ 中宣部：〈正確對待少數人鬧事的問題〉（1980年12月5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8-39，頁2。
- ④⑦ 西南交大校委：〈學生罷課情況簡報（六、八、九、十四）〉。
- ④⑨ 馮亦珍：〈上海一些工廠商店的職工對領導不關心群眾疾苦不滿出現罷工事件〉，《內部參考》，第101期（1980年12月8日），頁23。
- ⑤⑩ “Peking Magazine Says Students and Workers Have Staged Disorders”，A5.
- ⑤⑪ 王文俊：〈四川一些幹部擔心波蘭事件引起不良反應，希望各級領導當機立斷解決漲價風等問題〉，《內部參考》，第96期（1980年11月21日），頁2。
- ⑤⑫ 馮亦珍：〈上海一些工廠商店的職工對領導不關心群眾疾苦不滿出現罷工事件〉，頁22；上海市集體事業辦公室：〈關於上海市虹口區三個街道工廠部分職工怠工、罷工事件的補充報告〉，頁59。
- ⑤⑬⑭ Domenico M. Nuti, “The Polish Crisis: Economic Factors and Constraints”, *Socialist Register*, vol. 18 (January 1981): 107; 106, 114.
- ⑤⑮ 李肇芬：〈全國許多大中城市鮮菜供應不足價格上漲〉，《內部參考》，第61期（1980年7月21日），頁30。
- ⑤⑯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蔬菜零售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百分之三十多〉，《內部參考》，第67期（1980年8月11日），頁31；黃家仿等：〈武漢福州南京西安等地幹部群眾對物價不斷上漲難以抵擋反映強烈〉，《內部參考》，第78期（1980年9月19日），頁2；吳建民：〈哈爾濱市部分國營商業帶頭哄抬物價〉、黃國文：〈杭州市物價愈漲愈烈〉，《內部參考》，第98期（1980年11月28日），頁1、12-13。
- ⑤⑰ 蕭冬連：〈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經濟調整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9期，頁72。
- ⑤⑱ 黃家仿等：〈武漢福州南京西安等地幹部群眾對物價不斷上漲難以抵擋反映強烈〉，頁2-6；王文俊：〈四川一些幹部擔心波蘭事件引起不良反應，希望各級領導當機立斷解決漲價風等問題〉，頁2；〈上海部分中老年職工有「三愁」、「四不滿意」〉，《內部參考》，第98期，頁14-15。
- ⑤⑲ 周鴻書：〈趙紫陽通知要求北京用主要力量煞漲價風提出生活必需品價值只准降不准漲〉，《內部參考》，第98期，頁2-3。
- ⑥⑰ 張向波：〈瀋陽部分職工認為亂漲價孕育着危險後果〉（1980年11月17日），《內部參考》，1980年第95期，頁19。
- ⑥⑲ 蕭冬連：《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5-12。
- ⑥⑳ 《在風浪中前進》，頁21；國家進出口委：〈對外經濟貿易工作匯報提綱〉（1981年7月4日），上海市檔案館，B1-9-439，頁4。
- ⑥㉑ Domenico M. Nuti, “The Polish Crisis”，114, 107; “Chronology of Events”，in *From Solidarity to Martial Law: The Polish Crisis of 1980-1981: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 Andrzej Paczkowski and Malcolm Byrne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xxix.
- ⑥㉒ 〈進出口委員會郭玉民同志講話記錄〉（1981年9月10日）；機械工業部：《1973-1982年我國技術和設備引進情況彙編》（內部資料，1983），頁1-2。
- ⑥㉓⑥㉔ 國家進出口委：〈對外經濟貿易工作匯報提綱〉，頁4。
- ⑥㉕ 泰文：〈二十二個大型引進項目不按基建程序辦事造成嚴重損失〉，《內部參考》，第94期（1980年11月14日），頁2-5；〈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第54號）〉。
- ⑥㉖ “Note of Talks between Comrade Petar Stambolic, Member of the SFRY and LCY Presidium, and Li Xiannian, CC CCP Chairman” (20 October 1980), *The Archives of Yugoslavia*, AJ, CK SKJ, 507/IX, 60/I-130.
- ⑥㉗ 國家計委：〈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收支指標〉（1979年5月15日），河北省檔案館，940-13-301，頁1；〈中央報告會記錄〉（1979年3月16日）。
- ⑦⑰ 趙紫陽：〈處理好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係〉（1980年11月15日），載《趙紫陽文集》編輯組編：《趙紫陽文集（1980-1989）》，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110-11。

- ⑦ Andrzej Paczkowski and Malcolm Byrne, "The Polish Crisis: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in *From Solidarity to Martial Law*, 5-6.
- ⑧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於當前宗教工作向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提綱〉（1980年12月8日）。
- ⑨ 〈中央領導同志會見外國記者談國內、國際問題〉（1980年10月24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5-17，頁91-97。
- ⑩ 王文俊：〈四川一些工廠企業的領導幹部對毛主席晚年所犯錯誤性質的看法〉，《內部參考》，第83期（1980年10月6日），頁7-8。
- ⑪ 葉世濤等：〈上海一些幹部學習鄧小平同志與意記者談話就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談自己的看法〉，《內部參考》，第81期（1980年9月29日），頁2-4。此說法於1980年上半年便在民眾和黨內幹部中流傳，並非上海幹部首創。
- ⑫ 〈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稿）簡報（第一組，1-27號）〉（1980年10月）。
- ⑬ 胡喬木：〈致胡耀邦〉（1980年7月30日），載《胡喬木書信集》，頁282。
- ⑭ 中宣部：〈當前幹部、群眾的思想動態〉（1980年10月3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8-39，頁3；王兆麟：〈西安團市委隊中學生進行思想摸底的情況〉，《內部參考》，第67期（1980年8月11日），頁9-11。
- ⑮⑯ 〈東歐五國對華關係的新動向〉（1980年12月5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8-39，頁8；11。
- ⑰ 商業部等：〈關於下達1982年供波蘭凍豬分割肉出口計劃的通知〉（1981年11月7日），上海市檔案館，B45-6-228，頁14。
- ⑱ 省委宣傳部：〈貫徹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精神的情況報告〉（1981年3月11日），甘肅省檔案館，93-003-0118，頁5-9。
- ⑲ 中宣部：〈關於匈牙利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1980年12月24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8-39，頁2。
- 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62-63；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頁102。
- ㉑㉒ 〈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0年12月25日）。
- ㉓ 趙紫陽：〈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1980年12月16日），載《趙紫陽文集（1980-1989）》，第一卷，頁132。
- ㉔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頁364-65。
- ㉕ 機械工業部：《1973-1982年我國技術和設備引進情況彙編》，頁1-2。
- ㉖ 中宣部：〈向各省市下發《波蘭罷工事件的教訓》一文〉（1980年12月25日），甘肅省檔案館，93-003-0073，頁73-99。
- ㉗ 〈黃華在地方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1年9月1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8-44，頁24。
- ㉘ 〈趙紫陽總理同外賓談國際形勢〉（1981年3月22至23日），《國際內參》，第27期（1981年4月27日），頁2。
- ㉙ 趙紫陽：〈財政工作要適應新情況 研究新問題〉（1981年8月3日），載《趙紫陽文集（1980-1989）》，第一卷，頁235；〈廣東要繼續在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中走在前面〉（1984年11月21日至29日），載《趙紫陽文集（1980-1989）》，第二卷，頁551；〈必須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1985年4月11日）、〈必須堅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1985年9月27日），載《趙紫陽文集（1980-1989）》，第三卷，頁129、189；〈搞穩一點，收緊一點〉（1987年8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物價和工資改革方案時的講話〉（1988年5月16日、19日），載《趙紫陽文集（1980-1989）》，第四卷，頁149、441。
- ㉚ 〈李先念會見巴基斯坦廣播電視代表團談話記錄〉（1981年8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B285-2-1290，頁24。
- ㉛ 〈中聯部副部長李淑鐸同志的講話〉（1986年9月）。